

東西湖文史資料

湖鄉人物

政协东西湖区文史学习委员会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东西湖文史资料

湖乡人物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政协东西湖区文史学习委员会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湖乡人物》

责任单位:政协东西湖区文史学习委员会

开本:210×142mm 大 32 开

印张: 10.125 印张 17 万字

版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内部准印证号:鄂武新内图字 2009 年第 015 号

承印单位:武汉市精伦达印刷有限公司

东西湖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湖乡人物》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正东

常务副主任:陈三发

副 主 任:李和坤 李言生 黄丽萍 杨忠年

顾 问:蒋方淮

委 员:陈建设 陈新阶 李小树 钱荣信

袁启发 李义国 沈永葆 李铃生

王万堤 王石巍

编 辑 组

主 编:陈新阶

副 主 编:李小树 钱荣信 王万堤 王石巍

编 辑:林正斗 李小树

封面设计:钮 爱

内 页 设 计:付元华



前 言

《湖乡人物》专辑即将付梓。在此,我们谨就编辑事宜及其内容、主旨略作说明。这里的“湖乡”专指东西湖地区,“人物”特指那些既积极而又有特出作为的人士,“湖乡人物”则指那些有本地籍属而在不同地区或不同领域、行当既积极而又有特出作为的人士和非本地籍属却在本地地区既积极而又有特出作为的人士。这些人有着难分难舍的湖乡情结,他们是广大湖乡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区政协决定为他们编写文史资料专辑,这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年初着手征稿时,人们曾有过这样的担心:东西湖地处城脚江隈,不过弹丸之地,这里会有多少“人物”可写?何以成书?殊不知,首批送来的稿件就有100多篇,截稿之后还陆陆续续有稿件送来,更何况许多众所周知的“湖乡人物”,我们还没有见到关于他们的稿件。“湖乡人物”一书难载,编委会选用了50多篇编辑出版——于是就有了我们手头这本专辑了。

书中所列50多人的生平故事,给我们折射出了千余年来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中华大地上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东西湖为湖乡人物的孕育成长、为他们施展才能建功立业提供了丰沛的乳汁及坚实的舞台;这些人物倾注了他们满腔激情和才智,奉献了青春年华乃至宝贵的生命,赢得了湖乡的解放改革、兴旺发展。触摸这曲折而巨大历史变迁中的人和事,总有一股又一股无形的力量冲击着我们的的心灵,使我们一次又一次为之感动、为之震撼。仔细体会,我们觉得冲击我们心灵的正是湖乡人物所秉赋的特有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就是由那些民间360行中的能工巧



匠们所体现的,勤于动手、巧于动脑,争当“人尖”高手的“行当状元”精神;就是由那些士绅鸿儒所体现的,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殚精竭虑为家乡父老子弟们做好事办实事的“造福乡梓”精神;就是由那些革命勋烈、改革干将所体现的,洞悉大局、敏察时趋,自救救人、自度度人、敢作敢为、勇探新路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就是由那些著书立说、领军一方的专家学者所体现的,勤奋学习、精心钻研、矢志于思想、科技领域攀登高峰、扩土拓疆的“科技创新”精神;就是由那些高官微吏所体现的敬重官德、清正严明、建功一方、泽惠百姓的“廉官练吏”精神。已经入书的 50 多人以及更多尚未入书的湖乡人物,他们是湖乡人中的佼佼者,是湖乡人的代表和骄傲,他们所体现的精神,也就是湖乡人的主体精神。这种精神是湖乡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50 多篇稿件,虽然在撰著的具体角度、形式和篇幅上相去甚远,但在根本旨意上却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给湖乡人物立传树碑,就是表达对他们的敬仰,就是要让他们的精神在我们正在从事的和谐社会建设现实实践中得到弘扬光大。我们深信,在这民族振兴的伟大时代,在东西湖新一轮开放开发进程中,必定会涌现出更多更杰出的人物,湖乡社会必定会建设得更加和谐美好,《湖乡人物》也必定会以更加精采的篇章展现在世人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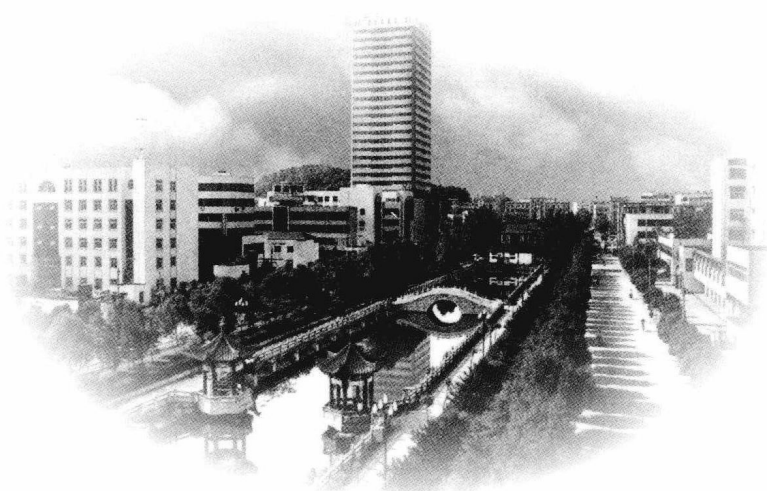
目 录

东西湖工作五年回忆	(3)
围垦老战士杜子才	(18)
彭茂功的几件事	(20)
林正汉其人	(25)
令人难忘的农场场长——石耀先	(30)
老劳模肖太哇	(33)
省劳模朱宝玉的少年时代	(35)
平民医生邱正中	(38)
人民的好医生王永亮	(41)
孙武评传	(44)
辛亥首义敢死队长罗良斌	(48)
南明兵部尚书张京	(56)
明侯补充禄寺丞刘朝阙	(59)
治学严谨的刘传莹	(61)
享誉汉中的柏泉人魏席儒	(65)
清直隶州知州刘传曾	(68)

“忠孝传家”的刘作熊	(70)
湖北才子汪大镛	(72)
王海山同志抗战时期的故事	(75)
老红军赵燕飞	(81)
王旭坤献身革命三十年	(86)
抗日巾帼英雄肖雾英	(89)
新四军战士周源卿	(91)
三次选择人生路	(99)
“八一”式步枪研制者蔡静安	(102)
著名哲学家张世英	(104)
湖北学界的领导人密加凡	(137)
我参加革命工作的片断回忆	(144)
永远的李格非	(157)
著名经济学家陈恕祥	(186)
周次白的艺术生涯	(188)
闻一多高足彭兰	(192)
音乐家齐伊在东西湖	(199)
我的曾祖父书法家赵石桥	(202)
她为胡总书记做翻译	(204)
中国第一代民用核工作者张延发	(208)
我从湖乡走上大学讲坛	(211)

宝剑锋从磨砺出	(216)
水产养殖专家梁文忠	(221)
“创造了汉口”的历史风云人物刘歆生	(224)
武汉纺织巨头张松樵	(228)
“木炭汽车大王”高国恕	(238)
声震警界的刘人菊	(244)
民国时期的著名律师郭宗燮	(246)
地方名医李伯儒	(251)
新沟镇水码头说书艺人李少霆	(254)
德高艺精的张金廷	(256)
走出国门的高级泥匠詹财斌	(258)
爱乡台胞宋瑞临	(260)
酒瓶文化人许三尤	(262)
“环保艺人”管芳慧	(268)

湖乡人物





东西湖工作五年回忆

冀晨曦

按：冀晨曦同志 1917 年生于河北省枣强县冀王滩村。1938 年加入共产党，历任河北省枣强县第四区工作员，第七区战委会干事、部长，区委委员兼青委会主任，冀南区二分区青委会组织部长、救国会组织部长，枣强县抗联青年部长等职。

建国后，先后任湖北省谷城县委书记，襄阳地委城工部长兼襄樊市委书记，襄阳专区公署专员，湖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厅长。

1960 年，调东西湖农管局任副局长，1961 年 3 月，任东西湖农管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在主持东西湖农管局工作的五年里，切实贯彻省、市委确定的以粮为主、粮菜并重、大力发展副食品（包括畜牧业、渔业、林果业）生产方针和“三包一奖”（包产量产值、包上缴利润、包成本费用、超产节约有奖）的政策，使东西湖的面貌比初创时期有很大改观。

1966 年 9 月后，调任武汉市委农委书记，武汉市农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市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1986 年，经批准享受副市级待遇，1987 年离职休养，1994 年，经批准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1998 年 8 月 3 日病逝于武汉。

本篇回忆录成稿于 1988 年。是一份难得的东西湖场史教材，读来感人肺腑。

1959 年冬，我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免去了湖北省农业厅厅长职务。1960 年 1 月 5 日，被下放到武汉市国营农场管理局工作。



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解难题

1960年,我基本上是作了一年的调查研究工作,走遍了东西湖各个角落,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1961年2月的一天,张体学省长代表省委通知我到他办公室谈话。他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对你的处分问题要平反。平反以后,对于我的工作安排有几种意见:王任重同志要我回省农业厅恢复原职务;张体学同志要我到省供销合作社任主任,同时对我说,武汉市要留你任东西湖农管局党委书记职务。他说他赞成这个意见,要我在东西湖工作几年,把粮食生产搞上去,再回省工作;我个人则要求还是搞农业,最好能够到地区去。经过省委研究最后决定,要我在武汉市东西湖工作。1961年3月,武汉市委任命我为东西湖农管局党委书记兼局长。这样安排,虽然没有完全落实我的职务待遇,但是党的干部要能上能下。加上一年来我和东西湖的干部、农工群众建立起来的感情,深深爱上了这个地方,愿意竭尽全力开发建设东西湖,有信心、有决心把蔬菜粮食生产搞上去,为城市服务。

尽管全国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东西湖困难很多,但同时我清楚地看到有利条件也是很多的:第一,中央有甄别平反的精神。1961年6月,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彻底甄别平反的指示,对1959年以来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坚决平反。当时邓小平总书记还指示统统摘帽子,不要留尾巴;1962年1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指导思想明确。第二,党中央和毛主席坚决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有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并开始有所发展。第三,省委和市委领导都很关心和支持东西湖的工作,可争取直接解决一些工作上的问



题。第四,东西湖的广大干部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更加具备了搞好东西湖工作的聪明才智;农工群众普遍有建设好东西湖和改善生活的迫切愿望;一支艰苦创业的队伍开始形成。第五,东西湖土地肥沃,紧邻大城市,城乡互助,极有利于农场的发展和建设,客观上存在着战胜困难的条件。

以上所述,都是一年来调查研究,细心观察的结果,一个扬长避短、趋利除弊的方案在我思想上开始反复酝酿起来。这时,张体学同志对东西湖的工作抓得很紧,1962年5月间,他到东西湖住下来搞调查研究,和我们一起商量建设东西湖的方针大计。他深入实际、艰苦朴素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给我留下良好而又深刻的印象。经过他和市委、市人大负责同志宋侃夫、刘惠农、王克文、伍能光、魏廷槐、王家吉同志还有冉砚农同志等一起反复商讨,最后根据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东西湖的生产方针是:以粮为主,粮菜并重,大力发展食品(包括畜牧业、渔业、林果业)生产。这是当时省委和市委确定的方针,是在全国粮食极端困难时期,东西湖必须采取的应急方针,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方针。当时,我和市农委书记冉砚农同志都说过,没有粮食,就不能发展猪、渔、奶等副食品生产。尔后,农管局党委帮助各农场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具体方针。方针已经定了,但没有正确的具体政策,还是不行。当时,东西湖实行等级固定工资制,农工人平月工资三十一元半,已有近四年时间了,这个平均主义分配办法,挫伤了职工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在农工中有个顺口溜:“干不干,三十一元半;搞不搞,一天三餐饱”。开了荒播种,种了又荒,成本资金如数投放,年终一结算必然亏损。这使我想起了1955年,在省农业厅工作时遇到的一件事,当时农业厅在武昌县金水乡办起了畜牧科研所和畜牧中等专业学校,有田地三千多亩,当时对这一部份农民实行的是工资制。兴办一年的结果是粮食减产,出现了荒田荒地,经营亏损。1956年,把固定工资制改为比例工资制,这就是工资总额不变,按月预发



百分之七十到生产队,由生产队按工分发到人,年终结算时,完成计划指标的发工资百分之百,未完成指标的按比例发工资,超计划额的部份实行全奖。实行这样的工资政策以后,这个大队每年增产,效果明显。我想东西湖这样一个大型国营农场,非有经济政策不可,必须用经济手段才能迅速扭转这个困难局面。但仅仅只有个人的想法没有用,还要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付诸实施。

甄别平反,调动干部积极性

在“反右倾”运动中伤害了不少干部,不平反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我是“反右倾”中被错误处理的干部,深知调动干部积极性的重要。因此,决心遵照中央和省、市委的指示,认真对干部进行平反,调动干部的积极性。

1961年6月,局党委召开了平反会议。会议开始时我就讲:平反,就是说“反右倾”错了,凡处分错了的干部就要平反。东西湖大跃进时有浮夸风,但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好多同志因说了实话受了批评和处分,广大干部特别是一些老干部,建场以来与职工群众同甘共苦,发挥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办好农场就需要这种精神。这次平反会议,就是要达到团结一致,艰苦创业,办好农场的目的。为了解决好干部中的这个突出问题,会议进行了近二十天,争取把会开好,还专门开过多次小会。几乎每次会议,都请市委秘书长王家吉和市农委书记冉砚农同志参加并讲话,以促使各级干部对平反工作的重视。农管局和各场的干部也讲自己的亲身经历,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总结;大家在发言中相互启发,彼此受教育;还有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干部等等,也都讲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到会的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径河农场王清正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伪军中为一名队副当通讯员,后来这个队起义了,王清正起义后参加八路军,还是当通讯员,1956年审干时,王清正被定为“限制使用”的干部,损伤了他



工作的积极性。在这次平反中,市委批准撤销了“限制使用”的内容,尔后任径河农场党委书记,他心情舒畅。另外,相类似情况的干部还启用了几个。广大干部由原来的怨气变成了正气,积极性空前高涨。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研究新的领导班子,经过反复讨论,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最后市委批准曾宪智任副书记,张培成、张连启任副书记兼副局长,张乃俭任副局长。农管局所属农场书记、副书记、场长,副场长初步进行了调整,各农场的党委班子也进行了初步调整。在平反会议中,有的同志提出周欣山、王安仁、李玉明等同志,调出东西湖农场不妥,要求把他们三位同志调回东西湖。我将这些意见及时向市委作了汇报,市委采纳了这些意见,于1961年9月,周欣山同志任农管局副书记兼副局长。王安仁、吴勇、王子均同志任副局长。李玉明调回任柏泉农场任党委书记,后任局政治部主任。经市政府批准,建立武汉市人民委员会东西湖办事处,主任王安仁,副主任张乃俭。

紧接着,各农场对本场的中层干部以及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中的错案进行了平反,调整班子,择优任用。把各级干部安排好,尽一切努力减少对立面。经过一系列的工作以后,从农管局到生产队近千名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新沟农场的一个大队长王文山,1956年该场原属汉阳县时,因工作过失使一个人致死,他被判刑。到1960年又加刑,又送监狱,这显然不妥。平反中,我们把他从监狱里接出来,并任大队长。1961年到1964年他把大队搞得很好,全局闻名。通过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认真落实了政策,干部情绪振奋,上下左右空前团结,工作积极性高涨,为办好东西湖农场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和政治思想基础。

干部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群众积极性的问题。当时,各农场几乎都欠农工的工资,最突出的是柏泉农场,欠农工的工资达三、四个月,本来就很低的口粮指标,还因为没有钱也买不回去,群众吃饭成了问题。春耕资金也十分紧张,群众情绪低落。我们将



这些情况及时向张体学省长作了汇报,省委很重视,解决了三百万元左右的资金。这笔钱除了全部还清1960年所欠农工的工资以外,其余都补充了当年的春耕生产资金,这样,群众的生产情绪也调动起来了。

经过甄别平反,补发拖欠农工的工资以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解决了存在的突出问题,一些思想问题也随之自觉地得到解决。曾经一度使农场干部感到困惑难解的血吸虫病问题,成为一些不安心农场工作的人要求调走的借口,这就是农场干部常说的“恐血吸虫病”。自从我们抓了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的工作以后,闹“恐血吸虫病”的基本没有了,这不是说不存在血吸虫病,更不是说血吸虫病对人们的健康没有威胁,而是说这一问题在大家思想上得到了正确的处理。

加强管理,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

1961年下半年,在东西湖开始试行将生产资金、生产任务、工资和利润下达到生产队的办法。实行了这个办法的变革口号叫做:打破铁饭碗,换上橡皮饭碗。各农场都拿一两个生产队试验,普遍收到了效果。新沟农场党委书记李云峰同志试行很成功,并取得了创造性经验,贡献突出。后来我们认真地进行了总结,归纳为“三包一奖”,即:包产值,包上交利润,包成本费用,超产和节约有奖。这套办法,在那“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盛行的年代,是一个冒政治风险的大胆探索,但它确实管用,是办好农场促进生产迅速发展的关键政策。

我们在探索中实践,制订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方案,先向赵辛初等省委领导同志汇报,他们表示赞成,同意试行,并要求我们向市委汇报。宋侃夫同志也表示赞成,要我们先试行,然后再发文件。1962年,在大部分生产队实行了“三包一奖”的政策,打破了农场与农场、队与队和农工之间的平均主义思想,取得了明显的